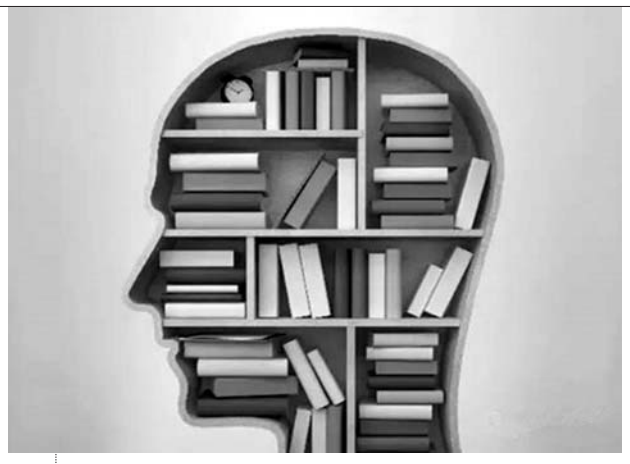

【热点冷议】

『听』的越来越多 『读』的越来越少

□王昱

最近,文化圈里发生了件新鲜事儿。知名媒体人马东联合《罗辑思维》在喜马拉雅上推出了一档名为《好好说话》的栏目,说要“教人怎么说话”。

你听了这消息也许会乐:说话还用他教?别说,人家不仅要教,还得付费才能听,全套课听下来要190元,可不便宜啊!而这个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的策划,在首发当日居然收入突破500万元,让人直呼看不懂——中国人怎么了?为什么突然有那么多人上赶着交钱学说话呢?

说起来,很多人对这档栏目爆红的不解其实倒好理解。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对说话这事就不怎么重视,甚至有些鄙夷。在这一点上,中华文明与同样古老的古希腊可谓走了两个极端。在希腊人那里,文字只是说话的一种辅助,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一干人等在言谈中都不吝于表达对辩论的推崇而指出文字的缺陷。在中国却刚好反过来,我们的先师孔子极其反感成天叨叨的碎嘴子,说什么“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后来的发展,也确实称了孔子的心。中国人越到后来就越不爱说话——战国时代,好歹还有孟子、惠施、公孙龙这样的好辩之徒跟人争(tai)鸣(gang)一下。到了始皇帝“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时,由于法家人士对“好冶怪说”者有刻骨仇恨,再这么碎嘴子就得斩首弃市了。当然,在汉代,国家干部选拔任用(察举制度)还是比较重“面试”的,所以知识分子还得偶尔搞个“月旦评”之类的文化沙龙练练嘴。然而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之后,皇帝们又把南朝孱弱的锅甩到了“谈玄论道”的头上,文化沙龙也被取消了。科举制创立后,考公务员成了“笔试”,耍嘴皮子在中华彻底丧失了应用价值。

之后的一千年,大多数中国人几乎是在沉默中度过的,我们有“沉默是金”、“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多一句不如少一句”等一系列成语民谚教人怎么做“哑巴”。文字工作者和语言工作者之间的尊卑更被拉大到了无比夸张的程度——若你说你是“写书的”,即便是兰陵笑笑生那样写黄色小说的,也好歹算个知识分子甚至“文学大家”。但你若自我介绍是“说书的”,那可毁了,就算你有单田芳老师那样一张铁嘴,仍脱不了被当做跑江湖卖艺的来对待。

中国人重文字而轻语言,这种传统有没有道理呢?在古代,这个道理当然是讲得通的。有别于古希腊那种在中心广场吼一嗓子恨不得全国人都能听到的城邦小国,我们很早就建立起了幅员辽阔的专制帝国。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信息用文字传播明显比口耳相传准确、便捷得多,而且皇上的话本来也就没啥商量的余地,言语相比文字所具有的对等交流优势毫无用武之地,所以,在语言和文字之间,中国人毅然选择了后者,我们甚至专门创造了一种脱离于口语的“文言文”,完全不考虑口耳相传的便捷性,只考虑怎样在当时十分昂贵的竹简和纸张上写下更多的信息。应当说中国人依赖这套晦涩难懂的“纯文字”在古代史上占了很大的便宜——为什么华夏文明能延绵三千五百年不绝,而西方历史经常写着写着就断篇了,动不动就闹出个三五百年不知道在干啥的“黑暗时代”?因为方块字、文言文比西方那些从语言直接转来的、一写一长串的拼音文字省纸多了,而简洁的东西就容易保留,如此而已。

然而,让我们曾占过便宜的重文字而轻语言的传统,如今却可能要过时了。世道变了,信息技术革命让“省纸”不再是个问题,用手机看段文字和下个音频听人把文章念出来同样方便。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考察文字和语言,相比于静下心来读段文字,听人说上一段实在简单方便太多——且不论那些“看书看皮、看报看题”的老年人和字还没认全的孩子,即便对有阅读能力的成年人来说,读一篇文章也是苦差事,大多数人其实都有阅读困难症,只是深浅不同而已。

明了了这一点,我们会对眼下的很多现象有更“开脑洞”的认识。如今各国都有调查机构声称人们对书籍报刊的阅读量正在下降,比如现在美国人比十年前年均少读2-3本书,报纸销量更是惨淡。是人们不爱读书、懒于接受信息了吗?是手机、电脑等信息终端争夺了读者的“阅读量”吗?都不是,只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习惯于更多的“听”和“看”而非“读”。

说到这里,很多人也许不免焦心。难道文字工作者的前途将是一片黯淡吗?也许恰恰相反,“书虫”们真正有活干的时代来临了——正如越来越多的人将不再“读”转而“听”,那些会读书、喜读书、能把书读出门道的人将会成为多数人的“代读员”。这将是一场伟大的重新分工,人类在文字中积累了数千年的思想和知识,将被这些“代读员”们重新“稀释”为语言。这将是一场新的“百年翻译运动”,懂得怎么说话的读书人将能抓住这个机遇。精明的马东和《罗辑思维》八成正是看到了这个机遇。这个时候用语言去教人知识,还刚好是教人怎么“好好说话”,算是“授人以渔”吧。想不火,的确也难。

【读书有道】

时人之书与经典之作:选择的两极?

□俞耕耘

历史上关于读书的讨论虽林林总总,然而,古人或许比我们幸运,“四书五经”这类必读书目就摆在那里,没的选,不读也得读。这倒解决了“选择困难症”患者的麻烦。略一总结,你会发现他们对读书的关注大抵纠结在是今文经书还是古文经书、是哪位学术大咖的注解、选取哪个善本、是读死书还是死读书等问题上。这些看似是古人的“作”,却也见出我们与古人的差距——那就是“不讲究”。

有人会说,这话太褊狭,我们很讲究形式感啊!我们会考虑选纸质书还是电子书、去书店买还是网上买、怎样凑单买、如何用券买等精细问题。然而,关于内容、译者和出版社等信息,却越来越无暇考虑。这不能怪读者,只能怪“出版垃圾”形成的“废墟”太多,读者鉴别难度增大,需要“深刨”才能找到几本真正的“硬货”。

学者许纪霖先生教给我们一个简易的“读书选择法”:多读经典,不读或少读时人之书。这难道是读书的“新保守主义”?经典是谁的经典?经典与非经典的界限又在哪里?死人就一定比活人写得好?然而,许先生此论自然有其道理,它基于个人阅读经历,所得乃自己之“道”。

读书本是极端个人化的体验,没什么确定恒常的选书原则。正所谓“法无定法”,然而许先生却道出重点所在。读书并不只是一种对象化的认识活动,事实上,每本书都是对人生命时长的一段占有。值不值得读,是读书选择的基点。就像人总是一种“目的论”动物,总愿意把精力花在有价值的人和事上。读书也要本本经典,才不算“吃亏”,才不致浪费。

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假想”设定,实际可操作性并不大。许先生或许忽略了读书的具体心理机制和功能需求。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以“求知”的心态来看书,他们对书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有学习就要有消遣,有严肃就会有娱乐。有人就是不想追求“意义”,有人就是油腻吃多了,想换点没营养的来刮肠油。大家都知道快餐是垃圾食品,为何还有人要吃?人们不顾喝碳酸饮料会让自己流失钙质,也要换一丝清凉。读书也会有放弃意义、追求愉悦快感的倾向。长期饮用纯净水会导致微量元素缺乏,只吃细粮则会缺少膳食纤维。读书和食物搭配都遵循同一个“杂食”逻辑。

当我们后悔、抱怨年轻时读了太多时兴书、无用书,恨不得从头来过、只填塞一堆经典时,我们只是“想当然”。人生并不能完全超越年龄层次的认识能力,做到“两点取直”。那种不走弯路的读书指导,我想年轻人也并不愿遵循。况且,只读经典著作,人的精神耐受力够吗?精神合理的松弛度能够保证吗?

许先生意在告诉我们,选择书要看重“源”与“流”、“原典”与“衍生货”的分野。形象地说,就是要多读“爷爷书”,不看或少看“孙子书”,这确实是一个“金法则”。看一堆评论、心得,这个史、那个纲,都比不上看一部原著文本受用。因为“衍生”很少有能达到“母体”的营养的。那么,问题来了,何是经典?经典之作与时人之书就一定是选择的“两极”吗?

在我看来,许先生强调了经典的“验证性”和“距离性”:它必须要经过历史的检视,与当下产生一种“距离”。正如后代修前代之史一样,当下时人之作无法获得考验后的“经典性”,这无疑很有道理。但是,时人之作可以少读,却不能不读。经典与当下之书的关系也绝非简单化的“两极”。因而,阅读本身就是在作品关系中的“行走”。正如我们看“烂片”,就要看看它烂到何处。没有反面教材,何来经典?不读时人之作,如何传承未来的经典?在我看来,先读经典,学得法眼;后读时人之作,针砭时弊,或许更有意义。

【所谓潮流】

因为我们一出生就老了 《魔兽》为什么受欢迎?

□韩松落

电影《魔兽》自6月8日在中国上映,截至6月26日,国内票房已超过14亿人民币,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2分。而在美国本土,票房却十分尴尬,首日票房仅1071万美元,有关机构预测,按照此趋势,它在美国的最终票房最多8000多万美元。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原因或许是:对中国观众来说,《魔兽》不仅是一部奇幻片,更是一部青春片。作为游戏,《魔兽》诞生已有二十年,在中国内地积累了数量巨大的玩家,据说,中国的《魔兽》玩家有1000万人,占了全球《魔兽》玩家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一百三十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是《魔兽》玩家,这些玩家未必都会去看电影,但他们的关注、议论却会激发更多人的好奇,他们走进电影院,也必然不是孤零零地去的,他们会带着女友和妻子,或者男友和丈夫,或者他们的孩子。

事实上,在电影院观看过《魔兽》之后,会对观众的来源有更深切的了解,我观看的那场,现场观众男性居多,年龄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他们中的好多人都穿着有标志的T恤。而我的朋友们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都遇到男性观众向身边人解说电影的情况,他们滔滔不绝,引起周围人的不满,但这或许也说明,他们正是那种“标准《魔兽》观众”,带着自己对《魔兽》的感情而来,而且一定要把自己的记忆和感受分享给身边人。

在我们的娱乐消费中,这种“情怀消费”随处可见。上世纪90年代末,齐秦、罗大佑开演唱会,就曾引起一波“情怀消费”大讨论,当时,他们的演唱会场场爆满,大批中年人组团观看演唱会,甚至为了演唱会包机北上,引起媒体极大的关注。此后十几年,人们不停地嘲笑这种情怀消费,对媒体炒作“情怀”感到不满,但它却总能酝酿一个又一个热点,《蓝精灵》、《哆啦A梦》大电影上映,《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上映,“纵贯线”开演唱会,邓丽君、张国荣、翁美玲忌日,都会让我们周围的70后、80后激动一阵子。就连周杰伦,也在他的演唱会上说:“哥唱的不是歌,唱的是回忆。”

我们的青春片,也在这种“情怀消费”的驱动下,显示出某种和别处的青春片不一样的特色。日本或者中国台湾地区的青春片,常常是“现在时”,书写的是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和爱情,场景和道具都没有太强烈的时代特色,基本上是在什么年代就说什么话。而内地青春片的主要时态却是“过去时”,故事的时间跨度超过十年,故事主题通常比较沉重,它们通常都在讲述回忆里的青春、爱情,往往带点苦涩,场景和道具的时代特色十分鲜明。因此,在那些与青春片有关的轶事里,我们常常听到剧组人员为了还原时代面貌到处寻找古旧的建筑和道具的故事。尽管这些青春片的背景也并不很早,不过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但那种回忆的基调,给小说和影视都蒙上了一层暗淡的色彩。

我们的年代感格外鲜明,陪伴70后、80后青春期的物品和影像,总能成为情怀消费的对象。因为,在别的国家或者地区,城市化进程早早完成,1990年和2010年的区别,或许没有那么大,而在我们这里,城市化进程近乎白热化,十年、二十年的进程,抵得上别处的三十年、五十年,十年、二十年里的城市景观、人际关系的变化,因此也非常激烈。所以,回望少年、青年时代,常常觉出一份诧异,觉得那仿佛前生前世,所谓情怀、所谓感慨油然而生,那些情怀的附着物,例如老歌、老电影、老游戏、老明星,因此能赢得更多的热爱。

在这种激烈的变动之前,我们常常有“一出生就老了”的感觉,五年、十年的时光,一场游戏里的春梦,一首歌曲里的往事,转眼就酝酿成情怀,供我们时时擦拭、慢慢回想。